

集序写作的“认题”与“立意”

——以钱谦益集序为例

赵宏祥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 钱谦益的很多文学批评理论都经由集序阐发。钱谦益集序是如何构思的? 在行文中又如何引入和安排自己的文学批评主张? 这些问题与古代文章学理论中的“认题”与“立意”相关。集序的开篇“认题”确立集序下笔“如何写”, 谋篇“立意”确定“写什么”, 一篇之中, 二者往往与集序所承载的文学批评主张直接相关。以“认题”“立意”推导钱谦益集序写作的思路, 不仅可以对钱谦益经由集序阐发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深入认识, 而且可以通过个案还原明清之际集序程式化写作的态势。

关键词: 钱谦益; 集序; 认题; 立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3-0169-07

序的文体内涵丰富, 集序作为其中的一类, 是伴随文集的出现而勃兴的。对创作进行总结, 并阐发文学观念与批评态度, 是集序的主要内容, 也使其成为承载文学批评主张的重要文体。

古代文集的生产, 随着时代演进, 总体呈现数量递增的态势, 这使得文集的作者身份逐渐去精英化。而伴随着流通、刊行方式的变革, 大量基层文人也有条件刻集行世。明清时期, 文人刻集呈现泛滥之势, 乃至产生一种为人“必有诗文集”^①的社会风气。随着文集编纂的不断泛化, 集序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因请托和投赠而作, 又使其往往还带有某些社交功能, 使得集序几乎成为当时文人普遍需要面对的应用文体, 进而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程式化特征。

钱谦益作为文坛领袖, 是明末清初文人交际网络的中心之一, 其文集^[1-2]中存有集序约 200 篇以上^②。不仅很多因应酬请托而作, 其文学批评主张也通过这些集序写作得到充分的表现^③。作为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 钱谦益的许多文学批评主张都已成为明清文学研究中的论题。考察其集序写作的构思方式, 不仅可以个案式地了解当时集序的生产模式, 而且由钱谦益集序所具有的典范性意义, 也能窥见明清之际集序写作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钱谦益集序写作的开篇“认题”

“认题”是中国古代文章学理论对作文审题的总结。宋元以来, 往往“以场屋程序的眼光解构作为古文的序, 从而使古文写作有‘法’可依”^[3]。如吕祖谦说:“作记序, 若要起头省力, 且就题说起。”真德秀则指出:“序多以典籍文书为题, 序所以作之意……姑当以程文为式, 而措词立意, 则以古文为法可也。”^{[4](1021)}虽然文人集序写作与科举命题作文之间区别明显, 但开篇如何进入话题, 却是文章作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在宋人的文话中, “认题”大致等同于审题。“立意”则是由审题进而确立文章的中心思想。最早对此进行精确阐述的陈傅良在《论说》中就指出:“凡作论之要, 莫先于体认题意。故见题目, 必详观其出处上下文, 及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 方可立意。”^{[5](4)}可见, 科举中的“认题”是为应对具体的考试题目进行的思维活动。而在集序写作过程中, 序作者的理解并没有固定范围, 所以通用“某某集序”的标题, 对序的内容并没有指向意义。事实上, 序有叙事、议论两体, 如何确定采用叙事还是议论, 以及用怎样的方式展开

收稿日期: 2017-10-30; 修回日期: 2018-03-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 中山大学 2017 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清人注清诗研究”(17wkpy89)

作者简介: 赵宏祥(1987—), 男, 山西山阴人, 中山大学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文体学、清代诗学, 联系邮箱: nhglory@sina.com

叙事、议论,才构成集序写作的“认题”,这也决定了一篇集序究竟如何开篇。

以钱谦益的集序为例,可知“认题”往往呈现为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通过交代集作者的生平始末,将说明对象由集转化为集作者,可以总结为“以人认题”。

以《陈鸿节诗集叙》为例:

陈遯,字鸿节,闽之侯官人也。少为诸生,忽忽不得志。一日尽发篋衍中应举文字以所著衣巾,燔之而儻其灰。逃入越王山中^{[1](940)}。

在集序写作中,近于传体的写法自集序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④,至明代“古之序者,先序其人,再序其集”^{[6](351)}的观念依然存在。经由“认题”虚拟出“某某传”式的集序,不仅有助于读者“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且对集作者也起到彰显事迹的作用。为人作集序,如果对集作者足够了解,就构思而言,采用这种写法开篇无疑是最为省力的一种。

通过传记引入集序的“以人认题”,虽有优点,但缺点同样存在。如一篇之中大量文字用于纪传,不但难以充分展开文学批评的阐发,而且构思趋同,必使千篇一貌,陷入窠臼。如魏禧所道:“叙人之诗若文者……盖一叙,而其人之传志、家谱无俟他考已具……夫欲人之叙之者,使其传已也,叙之者欲传其人也。当其手墨未干,人之视之,固已如大夏毒热、腐鱼败肉之不可近,而一二真美亦卒为所拚抑而不传。”^{[7](361)}这就是针对以纪传为集序提出的批评。所谓“文最忌熟,熟则必俗”^{[4](3345)}。作为文章高手,钱谦益集序中虽然也有“以人认题”开篇的作品,但数量并不多见。

第二,由叙事片段作为“认题”,可以总结为“以事认题”。

以《顾太史文集序》为例:

故春坊谕德昆山顾公升伯,讳天竣,有文集若干卷。歿后数年,邑令嘉善叶君刻之,以行于世,而其子某属余为序^{[1](902)}。

“以事认题”最直接的方法是交代与撰序缘起有关的时、地、人等。这样的写法看似符合序“叙始末,明事物”^{[4](2387)}的题中之义,但实际上钱谦益所叙多数并非集的源流始末,而将撰序缘起程式化地转为交代必要的时、地、人等信息。对于钱谦益而言,与集作者本人的熟识程度,是影响其“认题”的要素之一。

明代诗文集刊行泛滥,每一集出,必多请人作序传扬,致使作序的社交属性一再被强调。其中不免产生为陌生人作序的情况,交代此序因干请而起,几乎也成为集序“认题”开篇的固定格套。

相较上述“以事认题”更具文学意义的方式,则

是前置一个叙事片段,迂回反映集序所要表达的内容。以《邵幼青诗草序》为例:

辛巳二月,余将登黄山,憩余抡仲之桃源庵。日将夕矣,微雨霏霏,四山无人,白龙潭水撞耳如悬雷,顾而乐之。谓同游吴去尘曰:“此时安得一二高人逸士,剥啄款门,为空谷之足音乎?”俄而,篱落间飒拉有声,履齿特特然,则邵幼青偕其叔梁卿,俨然造焉,再拜而起曰:“吾两人宿春粮,从夫子于白岳而不及也,今乃得追杖屦于此。”皆出其诗以求正焉^{[1](934)}。

前置的叙事片段是钱谦益的个人经历与感受,或者可以与古人“本事”的概念等视,但交代并非集序中所有的个人化的内容,实际隐含了集序想要传达的信息。正如时人黄与坚《论学三说》所指:“往者吴梅村先生谓余曰‘古人作文多离题者何’,余曰‘此擒题,非离题也,凡遇一题,头脑必多,不能处处周市,得其要处,纵横发挥,总不离此,甚有将题面撇开,题之奥妙,恰已说尽。’”^{[4](3378)}《邵幼青诗草序》的开篇,即描绘登山所见诗情画意,看似离题,实际上是后文提出“诗其人,则其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的观点埋下线索。在前置叙事的引领下,序文不仅摆脱了近乎雷同的样貌,而且生动的叙事也使序文增添了不少文学性。

当然,如此开篇认题,不仅是钱谦益文字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因为现实中钱谦益与集作者之间确实存在供其驱遣的交往事件。可见,“以事认题”避免套路化的关键在于钱谦益与集作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为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第三,以文人所共知的知识作为引入集序的方式,即以“共同知识”开篇认题。

除了叙事外,议论也是序的一体。事实上,以“共同知识”认题就是由集作者、潜在读者都能理解的知识引出开篇,使集序的议论发生在此背景之下。找出所序之集与所构建背景的关系,就能得出集序议论所要表达的观点。以《范玺卿诗集序》为例:

今之谭诗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某宋,某元,某白。其甚者,则曰兼诸人而有之^{[1](910)}。

集序可以看作作序者、集作者、潜在读者三者通过文字进行沟通的桥梁。在《范玺卿诗集序》中,钱谦益开头即给出他对当时诗坛某种风气的评价,相当于由作序者提出一个话题作为沟通的背景。话题虽然反映作序者的观点,但却建立在三者都能理解的“共同知识”之上,使得集作者、潜在读者能产生共鸣。翻检明清以来的集序,不难发现很多基层文人喜欢在序的开头植入经典话语构建“共同知识”,以此作为开篇。但强行将所序之集与“共同知识”认题构建的经

典话语相联系，很容易对集作者过度美化。正如时人所痛诋：“世俗应酬文字，拟人……文必班马、诗必李杜，盖乞儿口语。”^[4](4009)]尽管集序的滥用会导致集序的评价失真，但也证实了以“共同知识”开篇认题，在集序写作中确实具有一些有效性和普遍性。

综上，以钱谦益所作集序为例，分析集序写作的开篇“认题”，从“如何写”这一角度对古人集序进行体认。可能会有人产生疑问：虽然古人辨明体制的时候指出集序有叙事、议论二体，但在实际的集序阅读中，会发现一篇之中，可能既有叙事又有议论，以上分析开篇“认题”的看法会不会以偏概全？事实上，确立开篇“认题”的意义，在于控制集序写作时的开放性思维，使得原本开放的写作路径，变得有限而且具有操作性。换句话说，开篇“认题”为集序写作规定了行文方向，但这种“规定”实际上却源于集序自身的文体属性，即叙事、议论二体。

二、谋篇“立意”与钱谦益集序的文学批评

开篇“认题”确立集序下笔“如何写”，谋篇“立意”则要确定集序“写什么”。在科举考试中，经由“认题”“立意”调动应考者对该知识领域的储备，从而发挥水平，顺利解题。

通过分析王应麟在《辞学指南》中所列出的试题，可以得知在宋代词科考试中，对序这一文体的命题多出自经史典籍^[4](1023)]。如以历书为题，按要求为之序，就必须掌握相关的历法知识及制度沿革。考生由此谋篇“认题”，然后再加以个人化的阐释，或叙史实源流，或论得失效验。对相关知识越熟悉，“认题”也就越准，而“立意”也就越高。

就集序写作而言，其“立意”首先应围绕序跋类文体的本位，即“序作者之意”。对“作者之意”进行体认，是集序核心的内容，可以理解为序作者与集作者之间的互动。当然，序作者也通过集序向潜在读者传递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批评意见，体现写作的主体性。也就是说，集序写作开篇“认题”容易，但从题目中“立意”，却与作者自身的写作能力与文学素养有关。钱谦益在明清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宣传其文学批评观点，很多时候就是他写作集序的谋篇“立意”所在。

以钱谦益的诗论中经常阐发的概念“元气”^⑤为例，可以分析其集序“立意”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钱谦益“元气”论的核心观点是：“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

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沲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巨志士之文章出焉。”钱谦益由此揭示了受人心世运感召，忠志之士发为文章，必然元气充盈，慷慨激昂。正如时人论文时指出：“文章必有所以然处，所以然者，必为文章之意，然非谓文章以忠孝为意，便处处接应忠孝。”^[4](3569)]同样，在集序中表达“元气”论，钱谦益并不是靠苍白的说教或者浮泛的褒扬，而是从“认题”到“立意”层层推进，使其文学批评主张的表达，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

以《孙幼度诗序》为例。这篇集序开篇写道：

戊寅之春，余病卧请室。同紲者闻边遽，惊而相告。余方手一编诗，吟咀不辍，挟策应之曰：以此占之，奴必不为害。告者不怪而去。居无何，边吏以乞款入告，举朝有喜色。告者复问：“子所诵何人诗？诗何以能占虏耶？”余展卷而应之曰：“此吾师高阳公之少子名铈字幼度之诗也。吾师为方叔元老，身系天下安危。诸公子皆奇伟雄骏，属橐鞬、握铅槩，以从公于行间，作为歌诗，往往风发泉涌，流传人间，而幼度其后出者也^[1](915)]。”

在序的开头，钱谦益首先用叙事的方式构建自己读孙幼度诗的场景，这个场景或许真实存在，或许是写文章所虚拟的，总之是“以事认题”，确立了行文的走向。这段叙事非常符合古代纪传文学虚实相间的传统。当时钱谦益因“丁丑狱案”被执在京。第二年，虽然“狱渐解”，但钱谦益尚未被释放。在事件真实的前提下，细节有所虚构，是传记文学的惯常写法。狱中与某人因诗而对话，其中“不惊”与“惊”的冲突对立，如同小说般具有张力。随后交代之所以“不惊”，是从所读孙幼度诗中获得了退敌的信心。整篇集序的“立意”显然就是试图说明为什么读孙幼度诗会有此效果。钱谦益对此的解释是：一是诗的作者是高阳公孙承宗的第六子孙铈(字幼度)，为人为文受到其父影响；二是孙铈的诗作于军旅生活中且“风发泉涌”。以这两点为线索，使其集序的“立意”有机地生长在“认题”模式确立的写作路径之中。

孙承宗是明末主持辽东军事的重臣、忠臣，钱谦益对其十分敬仰。不仅因为孙承宗是其座师，而且因为其师“以文学侍从之臣，自请当边关庙社之寄”(《少师高阳公奏议序》)^[1](891)]的经历契合钱谦益平夙“谈兵”的个人抱负。

崇祯十一年(1638)，清军进攻高阳县，孙承宗率领全城百姓及家人守城，城破后自缢殉国。孙承宗身后行状由钱谦益负责书写，对其师的文学能力，钱谦益曾有评论：

公生长北方,游学塞下,钟崆峒戴斗之气,负燕赵悲歌之节,为文章,雄健深厚,似其为人,不烦绳削,不事模拟。每一属笔,如蛟龙屈蟠,江河竞注,云雾汛集,波澜灏漾。虽未敢方诸古人,实近代所希有也^{[1](1160)}。

这段话可以视作其“元气”论的注脚。由此可知钱谦益的“元气”论,首先根植于人的襟怀气度。孙承宗作为忠臣志士,行文方能气格雄健、底蕴深厚。其次则是不事模拟,一空依傍,自出机杼才能“元气”充沛。

回到《孙幼度诗序》中,钱谦益论及孙幼度(铨)诗的风格,特地指出“今夫吾师者,国家之元气,浑沦盘礴,地负海涵,其余气演迤不尽,而后有幼度兄弟,而后有幼度兄弟之诗”,“故而徵国家之元气于吾师”,亦能“徵吾师之元气于幼度之诗”。正是接续开篇叙事伏下的线索,强调孙承宗对孙铨的影响,认为孙铨延续其父襟抱,为人为文已具“元气”。而孙幼度(铨)诗中风格、内容则正是“元气”具体的呈现。钱谦益以“光熊熊然、气灏灏然”概括孙幼度(铨)诗的风格,又指出其内容多围绕“忧军国,思朋友”而作,感情“忠厚惛怛,憔悴宛笃”。在明末国家多难之际,气格宏壮,关系时事的诗作,正是“元气”论所提倡的“宇宙偏沲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的具体呈现。

在钱谦益看来,文章与国运相关。在山雨欲来的历史时期,诗人的创作应该与国运时事相通,而不是一味脱离实际地用力模拟前人,刻意雕琢。他对当时以锺、谭为首的竟陵诗派深为不满,“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擅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著见文章而国运从之,岂亦‘五行志’所谓诗妖者乎?夫‘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8](571)}。所以在《孙幼度诗序》中,钱谦益独标其“号鲸鸣鼉,风樯阵马”,指其绝非钟谭一类“蝇声蚓窍,魑吟鬼哭”的衰世之音。

孙幼度(铨)在诗坛上寂寂无闻,钱谦益为其诗作序,并不是因私交而刻意拔高其文学水平,而是在抽绎“作者之意”的过程中,将孙幼度(铨)所作之诗纳入自己文学批评的理想范式中。如钱谦益所说:“余常谓论诗者,不当趣论其诗之妍媸巧拙,而先论其有诗无诗。所谓有诗者,惟其志意逼塞,才力愤盈,如风之怒于土囊,如水之壅于息壤,傍魄结轳,不能自喻,然后发作为诗。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间,

交互经纬,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诗,夫然后谓之有诗。”(《书瞿有仲诗卷》)^{[2](1557)}在他眼中,孙幼度(铨)无疑是一位“以资为诗”的诗人,其诗中也许妙辞好景不多,但充盈的元气也未尝不可以使其微于青史,验于人心。这也正是钱谦益提倡“元气”论的意义所在。

钱谦益能够驱遣集序“立意”来表达其文学批评理论,一方面的原因自然与其深谙集序写作有关,行文由“认题”到“立意”,环环相扣,立论有据,做到了“所以然处,得此而情境所发”^{[4](3569)}。另一方面则是深植于其固有的文学观念、眼光与积淀,有的而发,这是钱谦益集序能够有别于多数基层文人之作的重要原因。

三、钱谦益集序写作的“有意操控”

“知人论世”是古代文学批评实践的基本方法,其中一个重要命题就是“文如其人”。在钱谦益的集序写作中,也屡屡强调“文如其人”。钱谦益将其引申为“真性情”“真诗”,是其多篇集序着重阐发的核心思想^⑥。经由“认题”“立意”娴熟打造的集序,起承转合间牵丝伏脉,使得全篇逻辑谨严,让人信服。但这是否代表其笔下都是事实呢?试举一例,并以此展开讨论。

细读钱谦益《刘咸仲雪庵初稿序》,可知在此序中钱谦益特别强调刘咸仲因性情之真,而能出为“真诗”。因其人“眉宇轩豁,心腑呈露,以君父为天,以师友为命”,故所作诗中“性情在焉”“眉宇心腑在焉”^{[1](909)}。

集序中所说的刘咸仲,名廷谏。检索文献,关于其人最易得的一篇传记出自光绪修《顺天府志》。

刘廷谏,字咸仲,号良哉,通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甚有名誉。有陕西民首韩宗功等人为奸细,三法悉议辟。廷谏曰:廷尉天下之平,若但据首词,遂律以叛,何平之有?御史杨涟然之,行令复察,得释者众。调吏部郎中,忤魏珪,罢。崇祯初,选郎陈启新上书,请废制科,罢行取。疏下部议,廷谏力言其谬,得不行,兵部尚书杨嗣昌夺情莅事,廷谏上疏谏,不纳。时,金派经纪运量,通民苦累,廷谏力陈当事疏免。司漕中官诬仓吏侵粮,廷谏亟请大司寇上闻,龚文等十五人出狱。前后在吏二十年,以耿介见泥不调,甲申,徵拜金都御史,卒^{[9](4687)}。

经过有清一代史料的层累和验证,对于传主行迹的记载一般不会出现大的偏差。传中“忤魏珪”指作为东林党人,刘廷谏为赵南星所用,在天启朝就因和

阉党斗争而声誉在外。《明史·赵南星传》有更详细的记载：天启朝中“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一时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10](6723)}。又检周亮工《尺牍新钞》所载刘廷谏一函，写道：“我辈束发读书，便思服官，而道路转修，学力转难。站定脚跟，展开眼孔，无论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即至显晦之途，亦须放下，而后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垂世。”（《与孙北海》）^{[11](299)}可见，刘廷谏应是个为官敢于直谏、耿介方正的士大夫。无论是做官还是为人，其人都是以忠君爱国、修身正行的准则要求自己，这与钱谦益集序所写几乎完全相合。

让人产生怀疑的却是刘廷谏在明亡之后的结局。志传中语焉不详的“甲申，徵拜金都御史，卒”，很容易让人产生其人是忠于大明，卒于任上的联想。检查明末清初之际的史料，又可为这样的联系提供佐证。如：

十九日丁未，四合城外，烟焰障天。宣武门守门太监王相尧领内丁千人开门应贼，伪将刘宗敏整军入……殉难者……吏部郎中刘廷谏……自缢^{[12](234)}。

此段出自文秉《烈皇小识》，是书“于当日谏台奏疏采录颇备”，故记载崇祯一朝史事颇为翔实。从这段材料中可以得见，当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城时，刘廷谏是追随皇上而殉节的。且此说并非孤证。在戴笠《怀陵流寇终始录》中，亦载有“吏部考功郎中刘廷谏，死于官”^{[13](97)}。这样的结局，正好印证了钱谦益集序所写其人“以君父为天，以师友为命”的襟抱。

然而，检至顾炎武所辑《明季实录》中的记载，却与以上两则史料大相径庭。在其卷一所钞《燕邸寔录》中记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神京陷落，殉节者寥寥二三十人，风节扫地”^{[14](156)}。转而纳降李自成者颇多，“受职之臣，志污也。服朝廷之冠带，受朝廷之封荫，反颜事，窜名贼籍，颜面何施，共计九十八人”^{[14](267)}。记有“考功司郎中刘廷谏，字良载，通州籍宁海人己未，伪府尹”^{[14](312)}。至卷三，在所钞《从逆诸臣考》中，亦有相同记载。而在计六奇《明季北略》中，据王世德《逆贼奸臣录》的记载，亦对其不利^[15-16]。可见，刘廷谏不但没有殉国，反而很可能真的是“从贼”了。

文人史料笔记相互矛盾，很难确定哪种说法正确，再检查清朝的官方档案，在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一封奏疏中，有人写道：

臣切思励相国家之功，必自旁招俊彦而始……，治理贵得其平，流品尤不容混，如举国皆知其贤，而犹使浮沉郎署，若考功司刘廷谏者，肝肠如雪，义气

凌云，政事文章，宁不足表仪一世，此不当破格显擢，风励有位哉！^{[17](67)}

不知举荐奏疏里“肝肠如雪，义气凌云”的文辞，是否源自钱谦益的序文。然而对刘廷谏的举荐，清廷确实看重，当日即批复，“刘廷谏才品素优，遇相应员缺即行推用”^{[17](67)}。至于随后有人上疏举荐称“咨俸独深、贤劳久著之刘廷谏，使之沉滞一司，非所以示公也”（《启为举荐贤员请敕部即行题补本》）^{[15](71)}，得到的批复竟然是“刘廷谏已有旨推用”了。平日忠君，临难投降。至此，方能理解顾炎武写下“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赴伪廷之举者”^{[18](1095)}的愤怒。

当然，对于历史人物应抱以理解之同情，这里并非想要以某些道德标准去声讨古人。在完全了解刘廷谏这个人物的基础上，再回头阅读钱谦益的集序，则可以发现“认题”“立意”的技巧，有时也会成为作者有意识“操控”文章表达的工具。

《刘咸仲雪庵初稿序》开篇即写道“余与咸仲交二十年矣”，然后钱谦益讲述最初结识其人是因为枚卜免官途经潞河，受到居于此的刘廷谏的接待。证之于当时钱谦益的诗，其尝云“能宽放弃惟良友，未忘京华为圣君”（《潞河别刘咸仲吏部》）^{[11](237)}。当时是钱谦益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刘廷谏的接待和宽慰自然让其难以忘怀。所以在集序中，刘廷谏被塑造成一个与唐朝阳城一样慷慨好义的人物。而后集序又讲述在丁丑狱案中，钱谦益再度入狱，却与刘廷谏相逢，遂应允为刘廷谏评阅诗文。

钱谦益素来相信“古之君子笃于诗教者，其深情感荡必着见于君臣朋友之间”，而“趣举两人(集作者)之交情”（《陆敕先诗稿序》）^{[2](824)}，也是他写作集序的惯用手法。这篇集序沿用“以事认题”的模式，叙述二人从结识到狱中相逢的过往，侧面写出刘廷谏对朋友真诚(潞城接待)，对国家忠贞(因谏下狱)。后文延续其脉络，指出刘廷谏其人“以君父为天，以师友为命”。集序的立意也由此延伸，这篇集序想要说明的并不是刘廷谏有多么高的诗学造诣，而是围绕一个“真”字刻画刘廷谏，所谓“有真咸仲，故有咸仲之真诗文”。而真诗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能够修正世间“葩花斗叶”“蝇声蚓窍”的伪诗文，而且在于可堪“华如桃李”，为“士大夫之光华悦豫”。显然，比之诗文，集序更推崇刘廷谏的为人，通过层层推进，刘廷谏的正面形象在集序中得到强化。由其“真诗文”再推导出“故有咸仲之真诗文，其斯为咸仲而已”，集序中形成了一个“人一文一人”的循环逻辑，能够使读者信服。

集序写作思路是开放的，钱谦益却愿意从“真”

字下笔,这是不是一种“有意”的“操控”,可能还需要更为深入的讨论。但是经过序中不断强化,刘廷谏“真”的形象树立了起来。在这里,读者也会欣然接受“为人真”而“为诗文真”的观点。只不过,在钱谦益写《孙幼度诗序》当年(崇祯九年,1637)的十一月,清军进攻高阳县,孙承宗引家人据守,阖门殉国。将史实与钱谦益集序对照,确实能够让人理解什么是“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而参照史料阅读《刘咸仲雪庵初稿序》,却不免给人带来一丝尴尬。虽然“文之至者,未有不动人者”^{[4](3331)},但有时“动人”者,也许只是文章技巧操控下的精美文字。

四、结语

明清之际集序写作趋于程式化、应酬化的态势,使得原本较为开放的集序写作思路变得相对固定,乃至所传达的信息只对集作者有价值,忽略了潜在读者的阅读需要。如清初张谦宜《茧斋论文》所指:“与人序诗,原非一概颂颺。有交深肺腑,淋漓痛快,直言无隐者,有交谈,至诣彼此相资者,又有初识其人,英锐可喜,微词引进,意在言表者。或为幼学执笔,就其门路之正,姑与浅言,此因人而发之意也。”^{[4](3906)}事实上,也是从“认题”和“立意”的角度对集序写作提出建议。“因人而发”仍是围绕集作者进行构思,以致集序的内容,往往充斥着对作者文学能力的拔高和颂扬。而“所述之人率碌碌无盛美可传,不能供作者之议论挥霍,世道好谀,必虚辞饰说,以夸眩于人”^{[4](7835)},则这类近乎“虚假”的集序大行于世,长此以往必然会使人厌^⑦。

以钱谦益集序为例,总结出开篇“认题”与谋篇“立意”的构思路径,使得开放式的集序写作变得有章可循。这并非钱谦益集序的特有现象,事实上应是明清时期所有集序的共同特征。但与张谦宜“因人而发”的集序写作理念不同,钱谦益的集序是“因己而发”。钱谦益将开篇之“认题”与谋篇之“立意”有机结合起来,使其能够为我所用。依托集序文本,除了向集作者宣扬己意外,更重视向集的潜在读者进行表达,这正是集序能够承载其文学批评主张的原因所在。进一步分析,建立在“认题”“立意”模式下,通过有效“操控”文本而产生的信息表达,使其有别于当时浮泛地褒扬作者的集序,钱谦益集序的说服力、真实感也往往因此而生。

综上所述,考察钱谦益的集序写作,以“认题”“立意”推导其写作思路,正是尝试以个案还原明清

之际集序程式化写作的路径。当然,正因为钱谦益集序写作超越了这种共同路径,才使得其有别于千篇一面的同质化集序,从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注释:

- ① 唐顺之在《答王遵岩》一函中写道:“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问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六,马美信,黄毅点校《唐顺之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第367页)此说固是一种讽刺,但从中亦可窥见当时刻集之普遍,集序书写之盛行。
- ② 这里的统计数据来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牧斋初学集》(2009)、《牧斋有学集》(1996)、《牧斋杂著》(2007)所收诗文别集、总集序。余英时在《原“序”:中国书写史上的一个特色》中则以钱谦益为例,说明“诗文集在16世纪已发展到‘爆炸’的地步”。并指出:“由于种种历史的变动,‘雅’文化在迅速地泛滥之中,印书市场的不断扩大更助长了刊刻文集的风气。诗文集的数量激增,‘序’的数量自然也随着水涨船高。明白了这一点,《初学集》和《有学集》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便不难索解了。”(《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 ③ 吉川幸次郎指出钱谦益的文学理论著述虽然不够集中,但却自成体系,一方面就体现在他给前辈晚辈所写的序文部分。参见其1980年所发表的《钱谦益的文学批评》一文(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1980年第4期;又见张连第译,《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第220页)。此后在钱谦益及明清文论的研究中,钱谦益集序被大量引用阐释,已成为讨论明清文学批评不能回避的重要材料。
- ④ 孙德谦《六朝丽指》“序录近传体”条指出:“《史记》列传,于其人有著述者,无不言之曲尽,直可作书序读。《隋书·经籍志》有刘向《别录》二十卷,其书久亡,然今以《管子》、《荀子》诸书录观之,或即取本传之文。近儒有曰:‘在人则谓之传,在书即谓之序。’此真不刊之言。余读任彦升《王文宪集序》与宇文道《庾子山文集序》,皆叙述生平,近于传体。”(《历代文话》第九册,第8485页)秦汉诸子的序传、叙录可以视作别集序前身。因立一家之言与文字流通的客观需要,且与史书、纪传文献之间互相承袭与采摭,所形成的序传、叙录传体传统,在别集序的产生和演化过程中有深刻影响。由魏晋至齐梁,别集序的写作范式虽逐渐演化发展,但都与传体保持紧密交融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另有《先唐别集序与传体之关系》(2017年中山大学“文体学青年学者研讨会”提交)一文专门进行讨论。
- ⑤ “元气”作为文学批评话语古已有之,最为重要的“夫文章为天地之元气”的表述始见元好问(《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归有光也曾写过类似表述如“余谓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与天地同流”(《项思尧文集序》)。钱谦益对元好问、归有光皆深为服膺,或受其影响,而更重要的则是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由家国之思、烈士之怀所触动。关于钱谦益“元气”的

种种阐释，严志雄《明清之际元气论》对此曾有关注，其论文发表于“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情、理、欲学术研讨会”，而在氏著《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论释》中则以“诗人就元气的化身”为论点，指出“牧斋的诗论与诗作”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自我技艺与自我实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年，第62—63页）

- ⑥ 钱谦益集序中对“真性情”“真诗”的引申，是其文论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此已有深入考察和讨论，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孙之梅《灵心、世运、学问——钱谦益的诗学纲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丁功谊《灵心、学问、世运、性情——论钱谦益的诗学思想》（《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等。
- ⑦ 明清以降，对文集、集序的滥刻滥写表达不满的意见很多，试举一例，如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中记载“某君欲自刻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参考文献：

- [1] 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2] 钱谦益. 牧斋有学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3] 祝尚书.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3(5)：96—105.
- [4] 王水照. 历代文话[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5] 陈傅良. 止斋论决[M].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6] 李开先. 李开先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7] 魏禧. 魏叔子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8]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下)[M]. 钱陆灿，辑.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周家楣. 繆荃孙. 光绪顺天府志人物志(八)[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 [10]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 周亮工. 尺牍新钞[M]. 长沙：岳麓书社，1986.
- [12] 文秉. 烈皇小识[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 [13] 戴笠. 怀陵流寇终始录[M]. 沈阳：辽沈书局，1993.
- [14] 顾炎武. 明季实录[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15] 计六奇. 明季北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16] 王世德. 逆贼奸臣录[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3辑[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8]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集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Subject recognition and conception establishment in preface writing: Taking Qian Qianyi's preface writings as an example

ZHAO Hongx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Many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 by Qian Qianyi are explaine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his preface writings. The issues how Qian Qianyi's preface writings are conceived and how he introduces and arranges his literary critical ideas in his preface writings are related to "subject recognition" and "conception establishment" in the ancient writings and literary theories of our count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face, "subject recognition" sets how to write upon starting the preface, while "conception establishment" determines what to write on. Therefore, of an article, the above two tend to involve directly the literary critical ideas that the preface embodies. Thus, deducing Qian Qianyi's preface writing thread from his "subject recognition" and "conception establishment" can offer not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Qian Qianyi's literary critical theories interpret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is prefaces, but also a case study of restoring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stylized preface writing method at the turn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Qian Qianyi; a collection of prefaces; subject recognition; conception establishment

[编辑：胡兴华]